

奇迹是如何创造的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 40 年轨迹

郑新立 著

 商务印书馆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迹是如何创造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 40 年轨迹/
郑新立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7-100-16452-8

I.①奇… II.①郑… III.①中国经济—经济体制
改革—研究 ②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①F121
②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1681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奇迹是如何创造的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 40 年轨迹
郑新立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6452-8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31 插页 4
定价:148.00 元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1945年2月12日，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上屯乡褚庄一个农村家庭。1964年从唐河一中高中毕业。1964—1970年在北京钢铁学院采矿系学习。1970—1978年在邯郸冶金矿山建设指挥部，先后做过工人、技术员、理论教员、理论教育科副科长、党委办公室副主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专业，1981年获得经济学硕士。

1981—1987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工作，曾任处级调研员、经济组副组长。1984—1986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两年。

1987—2000年，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先在国家信息中心任副总经济师两年，后在政策研究室工作11年，曾任副主任、主任、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

2000—2010年，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8—2013年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009年协助曾培炎同志创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009—2015年任常务副理事长。兼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2014年被评为上一年度中国十大著名经济学家。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关键是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 之间的平衡

稳增长做为短期调控目标，调结构做为长期战略目标，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必须正确把握短期调控与长期政策的关系，使短期调控符合长期战略要求。调结构不能以牺牲稳增长为代价，稳增长必须以结构调整来实现。

一、稳增长是今年经济工作第一位的任务

二、调结构是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必须实现的

（构）重大战略

三、把稳增长与调结构有机结合关键在改革

①、需要认真的决的认识问题

近平总书记：（送给李克强总理）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动我国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这是关系到我未来外交总体大局的重要举措，“中心”做了事项研究，认为设立由我主导的投融资机构，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对于做好我国外交和经济发展，乃至在亚、亚洲的繁荣稳定都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现将“建议”报上，请阅示。

曾培炎
四月十九日

关于设立由我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融资机构的建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指出，我国将加快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积极探讨搭建地

2013年4月，郑新立撰写了《关于设立由我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融资机构的建议》，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上报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得到充分肯定。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宣布建立亚投行的动议。2015年12月，亚投行正式成立。国外有评论认为，这是中国最富有智慧的建议，开创了全球金融的中国元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的突破

蒋正华

中国经济在过去 40 年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个成就主要来自于成功地进行了改革，而改革的成功又主要在于理论的突破和新体制的建立。我们在经济理论上主要有哪些突破，在认识上有哪些转变，并建立了哪些新制度呢？这些是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焦点，大体可归纳为六方面的内容：

明确了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开放前，我们实行的经济体制和政策，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认为公有制度越高越好，分配越平均化越好。结果阻碍了经济发展。事实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体制和政策一定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才能在改革中大胆建立起一整套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制度、新政策。

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实践证明这种制度束缚了生产力发展。4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从提出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到提出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注意不断改进和发挥好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作用。两者有机结合，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推动了经济平稳健康快速发展。

坚持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放手发展私营、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吸收民营企业入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规范的股份制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治理结构，使混合所有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方式。民营经济从无到有、迅速壮大，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是改革的重要突破。从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与公平并重，反映了我们在分配问题上不断进行政策调整的过程。如何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实现共享发展，正在成为政府着力解决的问题。

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通过推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的大发展。现在，正在推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促进土地规模化、专业化经营，以加快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村多种产业融合，加快乡村振兴。

始终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从改革初期兴办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城市，再到沿边和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我国逐步形成梯次开放格局。近几年建立自由贸易区和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进一步放宽外资进入领域，降低进口关税等，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开放型经济体系正在形成。事实证明，中国已经走出一条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道路。

郑新立所著《奇迹是如何创造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40年轨迹》一书，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揭示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功经验。由于作者长期从事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改革发展文件的起草工作，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长期参加或主持发展项目规划，

经常在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因此，他的文章更能准确地反映 40 年中央有关改革发展的决策背景、决策内容和决策落实的情况，特别是对上述六个方面重大改革理论的突破，书中都有比较详尽的阐述。对于希望全面了解中国改革经验的人，阅读这本书是一个捷径。

蒋正华

2018 年，北京

一部解读中国经济 40 年成功秘诀的书

厉以宁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前，中国之所以要进行改革，主要是基于对前 30 年实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实践证明，这种体制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主动地自觉地进行改革，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这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新的伟大觉醒。

在一个十亿以上人口的大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有理论指导和统一部署，必须制定明确的方针和政策，必须先试验，后推广。因此，研究改革的理论，制定改革的方案和政策，就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任务。改革从农村开始，继而推向城市；从搞活微观经济主体开始，进而推行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从沿海地区开始，逐步扩展到全国。正确的改革理论和政策来自于实践，来自广大基层群众和干部的创造。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总结基层的改革经验，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上升到理论，形成指导全国的改革方案，成为顺利推进改革的正确方法。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各级党政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大批人员都在探索和研究改革的有关问题。我们从对各个国家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中吸取有益的经验 and 借鉴。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理论和改革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涌现了一大批献身于改革的思想家、理论家

和积极的探索者。虽然大家的观点不尽相同，有时在有些问题上还有一些争执，但是由于改革的目标一致，大家都能相互理解。特别是当党的中央全会做出改革的《决定》之后，大家都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决定》的精神上来，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各方面形成合力，同心协力把改革推向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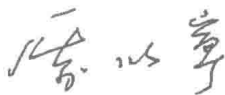
郑新立先生早在改革初期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工作，之后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从事经济政策研究，2000年之后，又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2009年退休后，协助曾培炎先生创办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继续为中央经济决策进行研究和咨询。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围绕中央有关改革文件和国家五年计划（规划）的起草工作，积极开展有关重大问题的研究，对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进行阐释。由于他的勤奋努力，写出了大量的经济理论文章，主要发表在《人民日报》、《求是》、《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杂志上。他还撰写和主编了一些经济著作，主要也是围绕着中央重大决策的研究和解读。郑新立在研究工作中能够独立思考，敢于从实际出发大胆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如1997年在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时提出发行长期建设债券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2013年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议等，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实施之后，在实践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于一个智库研究人员来说，能够深入研究问题，敢于提出建议并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对从事经济研究人员的基本要求。

郑新立的论文中不乏经济理论创新，他提出把最终产品率作为评价宏观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合理设立投资规模的界限，混合所有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建立城乡统一的房地产市场等，以及他在创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计划学和现代政策学方面的努力，都具有重要创新价值。作为千万个改革

理论和政策探索者中的一员，他以自己的努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程，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中文版和斯普林格出版发行英文版《奇迹是如何创造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 40 年轨迹》一书，是从郑新立多年来所发表的重要文章中精选出来的，真实地记录了各个时期改革的重大突破，记录了改革与发展如何相互促进、紧密结合，从不同侧面回答了中国 40 年的经济奇迹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它的出版，对于希望了解中国改革发展经验的人将会有所帮助。

201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了新的奋斗目标。到 2020 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未来 30 多年的奋斗目标，需要继续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不断深化，理论之树常青。根据实现新的奋斗目标的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前 40 年的理论和政策创新解决了当时所处时代的问题，未来所面临的新的问题有待新的理论和政策来解决。在不断解决新矛盾、新问题中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8 年，北京

文必初于日用

滕文生

1981 年秋，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为了充实和培养研究工作的后备人才，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首届毕业生中选调了 4 名同志，郑新立便是其中之一。我当时在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工作，新立同志被分配到经济组。1987 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撤销，我调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办事机构工作，新立同志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1993 年，我已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担任领导职务。这一年，受美中文化交流协会邀请，组织了一个赴美考察团，由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桂世镛任团长，我为随团顾问，新立同志为访问团成员，彼此度过了一段难忘的考察生活。

2000 年，新立同志从国家计委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岗位上调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我们又共事了几年。退休之后，我们又一起在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做些有关的研究工作。可谓几十年间多有交往，念兹在兹。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经济学界要为一些对改革发展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出版学术传记，新立同志作为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者入选，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入选者的光荣。学术传记是学者的学术研究历程及其成果的记录和展示，不同学者会有不同的学术贡献及其特色。学术有专攻，选编好一部某一方面的学术传记，如同在这一方面

建造一个“学术花园”，使之众彦齐集，交相辉映，异彩纷呈，于经国治事往往可以收到金声玉振、文韵流芳之效。

改革开放以来，新立同志虽然在不同部门和单位工作过，但大都是从事改革和发展中的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撰写过不少研究文章，同时还多次参与过党和国家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他的这些经历，不仅使他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发展实践和研究的亲身参与着，也使他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些重要理论和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见证者。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史诗般的历程中，所有的参与者和研究者，都会以自己这样那样的建树而奉献于其中。郑板桥曾说：“文必切于日用”；在学术风格上，“学者当自树旗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的指引下，新立同志的学术研究不仅有着自己的建树，也有着自已的研究特色与风格。他是集读书学习、调查研究、理论思考于一身，熔实践经验、认识升华、成果应用于一炉，而且是数十年间，一以贯之，别致其格，坚守其帜。这从新立同志的著述和学术传记中，可以清晰察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和学术研究者，坚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属难能可贵的。



2018年，北京

我和郑新立共同经历的改革岁月

魏礼群

我和郑新立相识是在1984年。当时由国家计委副主任宋邵文主持在哈尔滨召开计划体制改革研讨会，我在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新立在书记处研究室，我们对计划体制改革都很关注，而且他读研究生时的论文指导老师桂世镛在计委研究室担任领导工作，我们对桂世镛同志的学问和对年轻人的指导都很钦佩，所以相谈甚欢。

1987年书记处研究室撤销，郑新立分配到国家计委下属的国家信息中心工作。1989年在房维中、桂世镛领导下由我负责抽调人员组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八五”计划起草小组，新立同志参加，从此我们开始共同参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国家计委各种文稿的起草工作，一直到我们退休。在我们共同参加起草的文件中，有三个类型印象最深：

一是关于五年计划和规划以及每年由国家计委主任向全国人大所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报告的起草工作。“八五”计划以满足居民对吃穿用的需求、稳定市场价格为主要任务；“九五”计划主要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转变，实现第二步发展战略的任务。每个五年计划经全国人大批准实施后，我们又积极撰写阐释的文章和读本，宣传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方针政策。